

东方传统耻文化下的中日差异

孙庆忠, 丁若沙

(中国农业大学 人文与发展学院, 北京 100083)

[摘要] 《菊与刀》是研究日本“耻感文化”的奇作。与《菊与刀》中所描绘的日本“耻感文化”相比较, 中国传统的“耻”文化先有内容后有形式且形式因内容深化而完善; 日本“耻感文化”泊于中国, 先有形式后有内容, 但内容则与中国“耻”文化迥异。前者强调不论是哲人还是平民都要更为注重对内在“耻”感的修炼, 强调“内省”而知耻, 后者则把“他人对自己的承认”视为人生存在价值的核心, 强调“外辱”而知耻。

[关键词] “耻”文化; “耻感文化”; 《菊与刀》

[中图分类号] G0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245X(2008)05-0077-05

《菊与刀》是美国人类学家鲁思·本尼迪克特所著的一本研究日本民族性格的著作。全书重点探讨了维系日本社会稳定的根源、日本社会维系人际关系的要素及日本民族对于儿童的培养方式。从而揭示了支配日本国民行为的深层观念。作为民族文化模式论的典范, 这部作品对日本民族所谓“耻感文化”的形成原因及表现形态作出了细腻的描述和精当的分析。掩卷沉思, 不由得思考: 有着深厚历史人文积淀、与日本一衣带水的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耻”文化, 与《菊与刀》中所描绘的日本“耻感文化”, 其产生、演变和发展有着怎样的关联和不同呢?

一、“内在、渐进”还是“外促、突变”: 中国传统“耻”文化与日本“耻感文化”形成路径与方式不同

胡凡先生探讨中国传统“耻”文化形成问题认为, 古人很早就认识到羞耻的心理感觉在惩恶扬善、指导和制约人的行为方面所起的作用, 夏商周时期人们便注意用“耻”感来制约人的行为。人们的耻感来自于内在和外在两方面, 内在的是发自本人内心的羞耻, 外在的是需要某种外力加以侮辱使其感到羞耻^[1]。这在古籍上也多有记载。“瓶之罄矣, 维罍之耻。”(《诗·小雅·蓼莪》)这是周人认为自己的酒瓶空了,

喻指变穷了, 是统治阶级的耻辱。这可能是古人们对“耻”感所起到的社会作用的早期记录。时至春秋战国, 诸子百家对于“耻”文化的阐述就更多了, 尤其是儒学。“道之以政, 齐之以刑, 民免而无耻; 道之以德, 齐之以礼, 有耻且格。”(《论语·为政》)这是在说统治者对民众若单纯施以刑罚, 民众只能是被强迫免于罪过, 而不会产生羞耻之心; 但若用德、礼加以教化, 使他们产生“耻”感, 民众便将自觉向善、心悦诚服。《论语》将“耻”文化提升到了处理国家政务、统治民众的高度。儒家亚圣孟子强调“耻感”在个人人格塑造方面所起的重要作用: “人不可以无耻, 无耻之耻, 无耻矣”; “耻之于人大矣, 为机变之巧者, 无所用耻焉。”(《孟子·尽心上》)意思是说, 当一个人经历了从无羞耻之心到有羞耻之心, 便不会再做那些不好的事情了; 羞耻对于人关系重大, 做那些机谋巧诈之事的人是不知羞耻的。可见, “耻”文化在中国形成的时间可以追溯到很早的先秦, 并且在哲学大家的思想著述中得到了千锤百炼, 内涵上得到了丰富。最终儒家学派在“耻”文化的基础上孕育了“仁”“忠”“孝”“礼”等理论实体, 经久而不衰, 深深的印在了中国国民性格之中, 形成了我们现在所看到的中国传统“耻”文化。其形成的路径是内在因素的作用, 其形成的方式是渐进的。

日本学者森三树三郎指出, 日本“耻感文化”实际

[收稿日期] 2008-03-12

[作者简介] 孙庆忠(1969—), 男, 辽宁沈阳人, 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社会学系教授; 丁若沙(1987—), 男, 陕西铜川人, 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本科学士。

源于中国传统“耻”文化^[2]。这一观点,与《菊与刀》的论说基本相同。《菊与刀》对日本“耻感文化”的形成特点,阐释是精辟的。众所周知,公元7世纪,日本人将中国唐王朝的管理制度引入日本,同时也吸纳了中国传统的思想文化,并逐步形成了日本特色的严格的等级制度。在本尼迪克特看来,等级制度构成了日本民族文化的基础,承认等级制度的行为对他们来说就像呼吸一样自然。日本等级制度的严格很像古代印度的种姓制度,这一点与中国差别较大。《菊与刀》写道:“日本从一开始起就未能复制中国那种无等级的社会组织。日本所采纳的官位制,在中国是授给那些经过科举考试合格的行政官员的,在日本却授给了世袭贵族和封建领主。”^[3 41]本尼迪克特笔下的日本“耻感文化”的形成历程,是通过汲取外来形式而形成逐渐适应自身内涵的本土化的制度规范,本土化的制度规范构成了本土化的形式,进而促进自身内涵突变性的系统化、突变性的丰富与发展,原初的、世俗的、零散的内涵“飞跃”为升华了的、学术锤炼了的、系统化的内容,形成“耻感文化”。所以说,日本“耻感文化”是形式的系统化促进了内容的系统化,形式的系统化是日本“耻感文化”形成的重大契机,其形成具有路径的外促性、方式的突变性。这与中国传统“耻”文化形成中,内容与形式逐渐形成、有机结合与促进的内在、渐进特征,是不同的。日本“耻感文化”形成历程,与日本在公元7世纪吸纳中国政治制度进而完成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转化、并形成自身国民文化是一致的。

当然,日本就是日本,不是中国,日本不可能从输入的中国传统文化中复制到足以取代其等级制度的制度范式及生活方式,既不可能形成中国那种把人的身份、职业归纳到一个庞大宗族之中的宗族制度,也不可能形成中国人的世俗帝王观念,更不可能形成中国传统“耻”文化下的“仁”“忠”“孝”等伦理内容。日本在其等级制度下孕育形成的“耻感文化”内涵,支持着其等级制度不断加强;“耻感文化”内涵,在其等级制度下不断深化,两者相互依存,相得益彰。

二、侧重“内省”还是“外辱”:中国传统“耻”文化与日本“耻感文化”主要特征不同

不论是中国传统“耻”文化,还是日本“耻感文化”,其主要特征都可从“内省”和“外辱”两个方面分析。所谓“耻”文化、“耻感文化”之“内省”,即人们对“耻辱”侧重在认知、领悟,进而“自觉”、“自律”,从而避免羞耻之事发生。所谓“耻”文化、“耻感文化”之“外辱”,即人们对“耻辱”侧重于外部作用,看作是一

种他律性的道德,这种道德的保证是由于外部力量的约束与激励。中国人“耻”文化更多来自“内省”,而日本“耻感文化”更多来自御“外辱”,两者主要特征不同,区别较大。

中国传统“耻”文化,强调“内省”而知耻。“自天子以至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其本乱而未治者,否矣。”(《大学》)“正己而正人”,先“善其身”而再“善天下”(《孟子·尽心上》)。要求人们重视对自身的修炼,认为成为“身修”的人才是重要的事情,每个人都应努力做到。“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论语·学而》)中国传统文化更多对“内省”的追求,人们为人处世多考虑是否与内心世界的道德范式相吻合,其次才考虑对于自己的看法。在中国传统“耻”文化下,一个人努力修炼自己品行的目的,不是因为这样能给自己带来多少名誉,即修身并不是为了博得人们的赞许,而是一种内在文化的本质要求,这个过程是在自觉中完成的。再者,抱着靠不断修身而得到外界赞许的目的而去修身,对“耻”文化下的中国人来说,被认为是件耻辱的事。

在《菊与刀》描述中,“别人的评价”成为“日本人人格塑造的主要动力”,他们眼中的人生存在价值完全依赖他人对自己的承认^[4]。书中写到:“日本人持久不变的目标是名誉,这是博得普遍尊敬的必要条件。至于为实现这一目标而使用手段则根据情况而决定取舍。”^[3 118-119]在本尼迪克特笔下,日本国民是一个“极端自尊,在乎名誉,害怕失败、被辱和讥笑”^[5]的民族。即便是在性命攸关的情况下,日本人也要求不能表现出丑态,因为那将是被人耻笑的一幕。书中提到日本人在自己的战争宣传手册中无不强调“全世界的眼睛在注视着我们”。日本海军宪兵有一条诫令:在遭到鱼雷攻击而不得不弃舰时,也必须以最出色的姿态转移到救生艇上,否则“会被世人所耻笑”。可见日本人对外界的看法,多么在意。本尼迪克特还发现,在日本“耻感文化”中,一个人感到羞耻,是因为他被公开的耻笑、排斥,或是做耻辱的事被人们看到,也就是说日本国民的耻辱感基于他人在场,至少觉得他人可以知道。若某件耻辱之事不会为人所知,不良行为不会暴露,那么自己就不会认为有耻辱之事,自己也不会惧怕、忏悔,而且“有错误的人即使当众认错或忏悔也不会感到解脱”^[6]。这与其他民族尤其是中国传统“耻”文化极为不同,因为中国人做了羞耻之事终究会惶惶不安。正如本尼迪克特所写的:“在有的民族中,名誉的含义就是按照自己心中的理想自我而生活,这里,即使恶行不被人所发觉,自己也会有罪恶感”^[3 154]。

三、如何看待和遵从“忠、孝”: 中国传统“耻”文化与日本“耻感文化”主要内涵不同

“仁”, 作为儒家道德思想的基础, 是一切道德的前提, 包含了“忠”“孝”“礼”等广泛的道德观念。《论语·宪问》中写道: “子路曰: ‘桓公杀公子纠, 召忽死之, 管仲不死, 曰未仁乎?’ 子曰: ‘桓公九合诸侯, 不以兵车, 管仲之力也, 如其仁, 如其仁。’”孔子本来认为管仲事二主本应是不仁的, 但念其后来相桓公, 九合诸侯, 立下了汗马功劳, 也可算是忠心一片, 因而也可算作“仁”。说明“忠”以“仁”为前提。《论语·阳货》写道: 宰我曾问孔子“三年之丧, 期已久矣”, 宰我嫌服丧三年太久, 想改为服丧一年, 孔子认为宰我的这种行为不仁不孝: “子曰: ‘予之不仁也! 子生三年, 然后免于父母之怀。夫三年之丧, 天下之通丧也, 予也有三年之爱于其父母乎!’”孔子的观点表明, “孝”以“忠”为前提。可见, 在中国传统“耻”文化中, “忠”、“孝”的存在有条件的, 以“仁”为基础、为前提。在中国家庭, 子女对于长辈恪守孝道主要是基于内心对长辈生而养、养而教的感激之情, 而不是长辈的等级权威, 是因为长辈的“仁”。若父母生而不养、养而不教, 都被看作是父母的羞耻之事, 是不“仁”的行为, 人们多有指责, 子女对这样的父母不尽孝也为人所接受。中国历史上因统治者不“仁”而爆发的人民反抗事例举不胜举。本尼迪克特的《菊与刀》对中国“仁”以及“忠”“孝”等的看法, 是有见地的: “中国人并没有把这些(“忠”“孝”)道德看作是无条件的”, “(中国的)天子之所以能享有帝位, 是因为他们在施‘仁’政”, “中国的伦理学把‘仁’作为检疫一切人际关系的试金石”^{[3] 82}。

关于中国文化“仁”以及“忠”“孝”等的看法, 日本与中国迥异。在《菊与刀》中描写的日本“耻感文化”之伦理道德体系中, “仁”的内涵和地位与中国相差甚远。“‘仁’在日本是被排斥在伦理体系之外的德目, 丧失了它在中国伦理体系所具有的崇高地位”, “即使身居高位也不是必需具备的道德了”, 是“份外的事”而非“必需”的事。论及日本在中世纪为何未引进中国“仁”这一崇高伦理观念与传统, 日本学者朝和贯一认为: 中国传统“仁”的观点是明显与日本天皇制相悖的。甚至, 在日本国民眼中, “行仁义”类似地痞流氓间所谓的“江湖义气”。写到这里, 本尼迪克特举了一个例子: 一个恶棍窝藏了一个不属于自己同伙的另一个恶棍, 以避免后者的仇家来复仇, 这就是所谓“仁”, 日本人甚至认为美国码头上的工头与工人订立的非法契约也是“行仁义”^{[3] 83}。中国传统“耻”文化的“仁”, 在日本“耻感文化”之伦理道德体系中可谓面

目全非!

所以, 在这样一种无“仁”而谈“忠”“孝”的环境下, 日本人头脑中的“忠”“孝”观也与中国传统“耻”文化下的“忠”“孝”观有着很大的不同。在日本, “忠”即是对天皇的忠诚, 是对神格的天皇的无条件服从。众所周知, 天皇在日本人眼里就像基督徒看待耶稣一样, 是神格的, 天皇传达出的信息对于日本人来讲不是什么所谓“圣旨”而是“神谕”。日本人对于上级指示服从的不渝至今在日本社会也广泛存在, 有些人工作伊始在某家企业一生也不会改变, 即便有更好的机会。有些人说这是一种愚笨的不能促进社会进步的忠诚, 这样的结论也许有待商榷, 但日本人骨子里的那种夸张的忠诚却不容置疑。归其缘由不难发现, 日本“耻感文化”体系下不论是军政官员还是企业上级, 他们都是把天皇旨意往下传达的“中介”, 传达命令时他们代表的是天皇, 不遵守那便是对神旨意的亵渎。这种对于等级金字塔最顶端的忠诚在本尼迪克特笔下的日本人身上表现的让人不可思议: 1945年8月以前, “忠”要求日本国民对敌人作战到最后最后一兵一卒, 因而便出现了战场上除了日本士兵, 便是日本士兵尸体而罕有日本士兵俘虏的场景, 那些日本士兵驾驶着飞机、鱼雷以自杀为进攻冲向盟军部队的画面, 给世人留下了深刻印象。正是由于天皇传达出的信息对于日本人来讲不是什么所谓“圣旨”而是“神谕”, 所以, 当天皇宣布投降后, “忠”的表达方式在外人看来转了个180度的大弯, 几乎是全体日本人对外来者所表现出的极度合作以至于让盟军不知所措, 摸不清缘由。日本人这种对“忠”的体现, 许多西方学者至今都觉得不可思议。

对于“孝”的认知, 日本人也有着自己的特点。首先, 日本人奉“孝”道的根本动机是报恩。《菊与刀》提到, 恩情在日本人心中是一种复杂的、交织在繁琐的社会关系网中的、可与“金钱债务”和“合同履行”相类比的义务。这种“债务”贯穿在每一个日本人的一生, 在其出生时就需要承担, 也就是日本人自出生起便要对自己的尽孝对象“还债”。本尼迪克特形象的比喻“孝”在日本人际关系中就像是人们眼中的金钱债务一样, 背后有着强大的约束力, 类似美国人的应付账单或抵押贷款的利息一样。而且, 这样的关系不是在类似于父母病危的紧要关头才发生, 而是像阴影一样, 时时刻刻笼罩在人们心头, 就像纽约的农民时刻担心抵押, 华尔街的资本家卖空脱手后盯着行情上涨一样。看来, 日本人对“孝”的理解, 几乎是等价于对债务的理解。因此, 对于日本家庭中时常出现的“一个父亲是个不值得尊重的人, 却可以要求子女尽一切义

务”^{[3] 88}的现象,也就不难理解了。其次,在尽孝对象的范围上,日本与中国也有很大不同。日本人的尽孝范围不包括所在的庞大宗族或遥远世系,尽孝对象一般就是自己的父母。这当然与日本人在严格等级制度下大部分民众没有姓氏而难以形成衍生的宗族观念有很大关系,但更重要的原因是对“孝”本身的看法,即就是前边提到的“报恩”之说。

四、多于“教导”或是多于“嘲弄”:中国传统“耻”文化与日本“耻感文化”培养方式不同

一种文化思维,往往在一个人的少儿时期就有了雏形。在这一阶段,社会对于每一个体的培养思想会体现在相应的培养方式中。《菊与刀》一书的出版,使得关于东方“耻”文化或“耻感文化”思维的少儿培养思想与方式的比较研究,更为人所重视。

在中国传统“耻”文化下孕育出的儿童培养思想及方式,是沿着一种渐进的曲线发展的。孩子自出生起,就要接受长辈的教导,父母会给孩子教导各种各样的规则,有的是硬性的,不会因孩子的好恶而改变。学校教育是一种强竞争性的学习,即便是小学生,学校也会有期中、期末考试以检查督促孩子的学习情况,还将依成绩排名并通知家长,排名靠后的孩子们会因成绩不好受到学校或家长的批评、训斥,甚至是惩罚。在对孩子的激励方面,家长通常会采用正面激励的方法而很少讽刺自己的孩子,因为中国人觉得讽刺自己的孩子将会影响孩子的心理健康,而且因孩子做错事而对其讽刺也是得不偿失的,通常父母们会对孩子说类似“你真是个聪明的孩子”,“你最好自己完成这件事,这样你就是个很棒的孩子”的话,等等。于是,在这种培养方式下成长起来的孩子在年幼时就会明白一些道理,了解自己将肩负的某些责任。随着年龄的增长,孩子逐渐明白自己应该向着怎样的社会角色去努力。他们在青壮年时所表现出的创新思维,积极的会得到社会的鼓励,消极的也不会被社会所讽刺、侮辱,因为中国传统“耻”文化中,社会对于青年人的错误一般会归咎于它们的年轻,往往被人正面看待和谅解。但是,社会对于中老年的要求和约束是严格的,以至于认为中老年人应该是青年人学习的楷模。长者们应该、也必须留意自己的一言一行,甚至注意自己开玩笑的内容和方式,以便更好的扮演自己的社会角色,承担好自己的社会责任和义务。

《菊与刀》则告诉世人,中日对于孩子的培养大相径庭,有着不同的人生培养曲线。日本人对于孩子的培养走着一根很大的浅底U字型曲线,婴幼儿与老年

人同样享受着极大的道德自由,不必为羞耻和名誉而烦恼。只有青壮年,才会受到各种各样的约束,这种自由与约束的转化有时是极度夸张、令人难以想象的。幼儿时期的日本孩子会集家庭宠爱于一身,男孩子尤其如此。妈妈永远是一个对孩子什么愿望都答应满足的人,一个3岁孩童可以向母亲发泄任何怒火,可以在母亲甚至是祖母面前暴跳如雷。因而,日本大多数幼儿都有着暴躁的脾气。本尼迪克特形象的写道:“幼儿一个劲地用拳头打母亲,又哭又闹,极尽粗暴之能事,然后再把母亲珍惜地发髻弄乱。”这可谓是日本幼儿时期娇惯生活的真实写照。不过,在对幼儿培养的过程中,父母会逐渐将“嘲讽教育”渗透其中,为以后少、青年时期的教育方式做好铺垫。当有的幼儿依恋吃奶时,母亲便会对他说到:“如果要吃奶,那就还只是个娃娃。看你表弟,他才是个大人哩!他的年纪和你一样小,却不要吃奶。”^{[3] 181}当孩子哭闹时,大人们便会说“看那个小孩就不哭”。有时为了达到嘲讽的目的,主人与客人甚至会向演戏一样戏弄孩子。到了八九岁,孩子有时就要受到家里人真正的排斥、打击。如果老师向家里报告说他不上学或者有不逊的举动,或学习成绩不及格,家里人便会不理睬他。本尼迪克特写到自己认识的两位日本人,在10岁前曾两次遭到父母逐出家门,又因为感到羞耻也不敢到亲戚家去。他们在学校受到老师的处罚,后来只有在得到了母亲的调解后才能回家。在日本,高年级的孩子有时会被迫关在家里“谨慎”,即“悔过”。这里,本尼迪克特评价到:日本民族认为一个人若遭到社会的非难,全家人都将反对他,并且他会因得不到家庭的支持而得不到同龄人的支持。因为他违背“耻感文化”道德体系中最忌讳的被外人、被社会羞辱的这一原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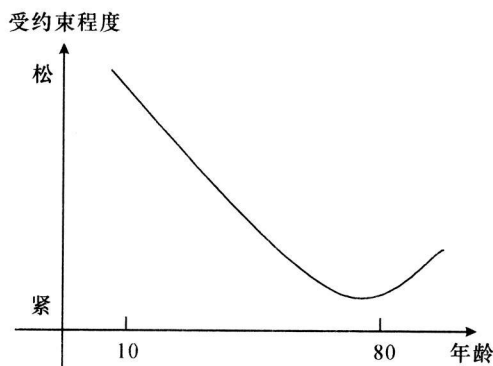


图 1

社会学家杰佛里·格拉认为,许多其他民族和教派集团的理念所认为的当集团成员受到其他集团成员的非难或攻击时,该集团均一致起而袒护。只要他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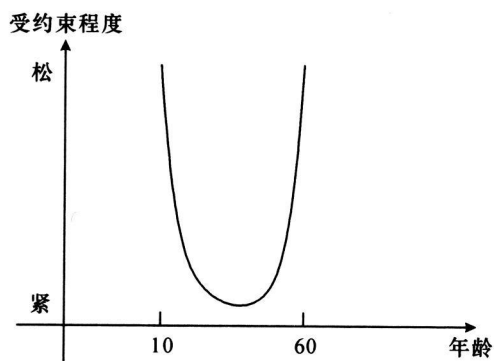


图 2

续得到本集团的赞同,他将在面对非本集团成员的非难和袭击时,勇于抵抗。而在日本这种情况似乎是相反的,日本社会对于个人的种种约束达到了极不寻常的程度。在日本民族观念中,只有得到其他集团的承认,才能指望本集团的支持。如果外部人不赞成或加以非难,本集团也会反对他、处罚他,除非他能使其他集团撤销这一非难或直到撤销这一非难。这又一次真实反映了“外部世界”的赞同在日本“耻感文化”中所占据的重要地位^{[3]190}。总的来讲,“耻感文化”的教育贯穿日本人成长的一生。这种教育方式是一种嘲讽式的教育。父母会以嘲弄的方式使孩子感到羞耻、冷落。父母总是以传达贬低否定等信息来嘲讽孩子,同时时常抬高别人使自己的孩子知道耻辱,这些给日本人的心理和人格带来了很大影响。本尼迪克特说这“对培养日本成年人明显害怕嘲笑和轻蔑是种肥沃的土壤”。这使得日本人幼儿时期开始就会有强烈的自我否定感、羞耻感,会对周围任何事充满戒心,谨慎的判断是否将使自己蒙受羞耻。因此可以说,日本人的“耻感文化”早在年幼时就已埋下种子,日本人性格基础在年幼时的教育中就已注定。

Difference in Oriental "Humiliation felt" Culture between China and Japan

SUN Qingzhong DING Ruoshan

(College of Humanities and Development, Chin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3, China)

Abstract "The Chrysanthemum and the Sword" is an unmatched book about Japanese "humiliation felt" culture. Compared to Japan's "humiliation felt culture" described by "the Chrysanthemum and the Sword", our national "humiliation" culture whose content precedes its form is progressed with the content deepened. Japanese "humiliation felt" culture whose form precedes its content originated from China, but its content differs diametrically from ours. Based on national people's thinking words and action, which holds that the value of life depends completely on others' acceptance, Japanese "humiliation felt" culture emphasizes "external aggression". Traditional "humiliation" culture of China, advocated by philosophers or civilians, pays more attention to cultivation of internal "humiliation" and stresses on "introspection".

Key words "Humiliation" Culture; "Humiliation felt Culture"; "the Chrysanthemum and the Sword"

总而言之,有着深厚历史人文积淀、与日本一衣带水的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耻”文化,与本尼迪克特的《菊与刀》书中所描绘的日本“耻感文化”相比较,前者先有内容后有形式,形式因内容深化而完善;后者形式泊来于前者,先有形式后有内容,但内容与曾吸纳其形式要素的中国“耻”文化迥异,是基于本国民众“人生存在价值完全依赖他人对自己的承认”的认为和言行而发展。在中国传统“耻”文化中,不论是哲人还是平民都更为注重对内在“耻”感的修炼,强调“内省”而知耻。而《菊与刀》中的日本,决定其“耻感文化”价值取向的则是外部力量,强调“外辱”而知耻。由此带来了中国与日本关于儿童培养的差异:中国是规定、训斥、惩罚与宽容、激励相结合的教育,而日本教育方式则以嘲讽式的教育为主,这也深深造成了中日民众在心理和人格层面上的很大不同。

[参 考 文 献]

- [1] 胡凡. 论中国传统耻感文化的形成[J]. 学习与探索, 1997(1): 136-142.
- [2] [日]森三树三郎. 名与耻的文化——中国、日本、欧洲文化比较研究[J]. 中日文化研究, 1995 自之卷: 118-122.
- [3] [美]本尼迪克特. 菊与刀[M]. 吕万和, 等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0: 41.
- [4] 王玉莲. 从《菊与刀》看日本民族文化[J]. 安徽文学, 2007(2): 154-157.
- [5] 冉红芳. 大和民族的核心结构“耻感文化”——续《菊与刀》[J]. 文教资料, 2007(17): 89.
- [6] 高登荣. 矛盾的日本人——从《菊与刀》看日本人[J]. 今日民族, 2007(3): 43-45.

(责任编辑: 司国安 靳荟莉)